

20世纪20—50年代在华俄侨的适应社会环境的特点

林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本文主旨就是要考察俄侨在流散族群几大局域化中心—满洲(东北)、华北和上海的环境适应特点。为此,就必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依据《现代外来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环境适应”指的是生物的构造和功能适应改变着的生存条件。“流散族群”这个名词术语表示居住在自己的故国之外或者族群生息地域之外,保持着族系同一的观念,并且不愿意丧失使之有别于居留国其余居民的群体特征被迫(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服从该国规制的族体或者族体的一部分。

[关键词] 20—50年代; 在华俄侨; 社会环境; 适应特点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9.644

最近15年,俄罗斯史学界出现了中国俄侨题目的大量论著,研究了该问题纷繁复杂的方方面面,还出现了一些史学和史料学性质的总结性论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1994年)莫斯科科学学术研讨会上命名为《一个全球性史学问题》的侨民适应社会环境话题声名鹊起¹。因此,围绕其至今仍在进行着争论的“俄侨”这一术语长久地进入了史学家们的词汇²。

在华俄侨适应社会环境的问题,在最近几年间问世的诸多综合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反映,例如考察西欧、亚非拉美国家各大俄侨群体质量和数量的И·Б·萨本尼科娃的专著《俄国侨民(1917—1939)比较类型学研究》中就存在远东情况³。M·A·帕夫洛夫斯卡娅、H·B·贡格罗娃、C·A·切尔卡申娜等人的研究成果(学位论文)也论述了在华俄侨适应社会环境的诸多问题⁴。

上述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俄国史学界展露的表明在华俄侨群体是一个独特的“国中之国”(И·Б·萨本尼科娃),一处具有完全自治权的某种封闭飞地(H·B·贡格罗娃)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主要是由最大一个侨民社区—满洲(中国东北)侨民社区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的情况造成的。白俄罗斯研究者H·E·阿布拉娃的专著《中东铁路与中国俄侨史》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该书乃是一部趣味极佳的俄侨学术著作之一,并且毕竟避免把全体在华俄侨的命运与中东铁路历史牵连起来⁵。

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对在华俄国流散族群的“封闭性”程度做出了不同估计。例如在哈尔滨研究过俄国东方学的历史学者M·A·帕夫洛夫斯卡娅认为,北满侨民共同体社会是一块文化上极端孤立的坚如磐石的飞地……,但也不是一个流散族群,“因为俄国人在那里尚未形成流散意识……”。这个论断得到该作者关于侨民在北满没有发生过环境适应问题,更谈不上被同化结论的支持。文化学者C·A·切尔卡申娜在这个问题上所见略有不同,她指出:年轻一代俄侨与老一辈不同,他们认同迥异于欧洲的古文化而且愿意学习和吸取异国他乡的文化,使之与俄国传统并行不悖⁷,相辅相成。

本文主旨就是要考察俄侨在流散族群几大局域化中心—满洲(东北)、华北和上海的环境适应特点。为此,就必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依据《现代外来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环境适应”指的是生物的构造和功能适应改变着的生存条件。“流散族群”这个名词术语表示居住在自己的故国之外或者族群生息地域之外,保持着同一族系的观念,并且不愿意丧失使之有别于居留国其余居民的群体特征被迫(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服从该国规制的族体或者族体的一部分⁸。

侨居流散族群命运取决于诸多内外因素。影响其环境适应过程的内部因素包括:侨民分迁散居的紧凑性、社会结构、利益共同性及其文化水平等等。流散族群一体化或分离化的外部因素则有:接受国提供给侨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

在华俄国流散族群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因为他们由局限于中国几个不同地区的侨族群(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等方面看)构成,并且没有能够协调其活动的中央自治机构,本文介绍过的流散族群(中国满洲|东北|上海|华北)历史也就各有其特点。俄国革命造成的难民大量涌入之时(1920—1922年),中国形式上还保持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分立割裂为地方军阀们秉政弄权的势力范围状态。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对俄侨持冷漠态度,而地方当局之间则内斗频仍,争权夺利,无暇顾及俄国难民流亡者们在自己的地盘各得其所安家落户,也不急于解决他们的问题。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存在,南北内战、“南京十年”、日本侵占满洲及随后侵占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就是决定中国俄侨当时生存于其间的政治环境的重大事件。

此外,在这一时期,半殖民地之成为日本与西方—主要是英美—双方经济政治利益冲突地带。在考虑到这样或那样影响侨民处境的多变政治形势,就可以把中国俄侨史划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1931年,即难民大批涌向中国,是逃亡求生的时期,期间最具活力的能量分子优先出道,侨民族群机构(慈善协会、同乡会、行业协会、教会等方面机构)在其各个地方局域化中心形成。当时中国内政局势特点是随着国民党政权于1928年在全国建立,从而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动乱终结了。对于流散族所在群的满洲的(东北)来说中东铁路有苏联存在的时期,这种情况牵扯到许多人失去基本的雇主(铁路),还出了导致边境地区难民大量流亡并且迁离战火地带的1929年中东铁路冲突事件。

第二时期—1932年至1937年7月,其标志是满洲(东北)俄侨命运急转直下,首先是该区域被日本侵占并且成立傀儡满洲国。“白俄”侨民区骤然落入占领当局的极严监控之下。敌占状态再次引发了俄侨由满洲大批迁入仍然处于日占势力范围之外的那些地区—主要是上海和东北,从而增加了当地侨民区的数量,得到机遇的那些人离开了中国,许多人在中东铁路卖出之后被遣返回苏联。在这个时期,侨民

机构的重组大体完结。

第三时期—1937至1941年12月,是由日本在华占领行动扩大和又一次俄侨大批迁出的浪潮决定的。上海侨民依靠来自日占势力范围的移民使其数量增长达到了峰值。凭治外法权与占领者分隔开来的外国租界成了“白俄”获救的庇护所。随着苏联抗击希特勒德国卫国战争的爆发,流散侨群中出现了拥苏派与那些把此战评估为对付世界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人分野迹象。

第四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以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占领体制严酷化、外国租界被纳入日本监控区,其居民乃至侨民经济状况都很困难为标志。在爱国热情因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而高涨的浪潮中,在华俄侨改入苏联籍的现象,蔚然成风。

第五个时期—1945年至50年代中期,包括在华俄侨族群史末期。这是俄国人重新流散出离中国的时期。1945年8月苏军解放满洲(东北)之后,对参加过反苏活动并且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侨民,开始了缉拿。成千上万的“白匪”和“间谍”被遣返苏联,许多人在爱国激情汹涌澎湃之际自愿离去。侨民工会的机构撤销了,留下来的侨民移交苏联领事馆监管,得到了苏联人暂住证。50年代中期,除了为数不多的人留下来以外,俄侨都离开了(东北)。其中一些人去了苏联垦荒,另一些人则离开了中国寻覓新家园。

在华北,剩余侨民存在到京津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垮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突然成。为共军占领区域难民流亡者的吸引中心的上海这时仍是中国俄侨的最后家园。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前夕,国际难民组织⁹安排了俄侨撤离工作。菲律宾图巴堡岛(译音)成为又一次流散全球之前中国剩余俄侨最后一处紧凑分居地。

在上述三处中国俄籍难民流亡者散居中心里面,满洲(东北)侨民群体实际上是处于与中东铁路专属自用地带俄罗斯生活方式的存在相联系的特别生存环境。俄侨世界的氛围消除了难民们与接收方社会之间社会文化冲突。习惯了中东铁路专属自用地带俄国人存在的中国原住民对新鲜的外来人是和善礼貌的。

该国排外风波的有所发作与当时的国民革命(1925—1927年)和随后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是相联系的。针对此事哈尔滨著名时政评论员A·阿斯塔霍夫曾指出:“与俄罗斯精神的近乎一场斗争在北满是由青年民族中国的思想者们进行的……”¹⁰。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的矛头在较大程度上却是指向日本、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俄国革命的牺牲品最后一次做了反帝斗争的靶子。与此同时,在其他难民流亡者散居中心,环境适应过程被不懂汉语、英语或者法语复杂化了,而在满洲语音障碍就不那么严重,因为相当大部分当地人有着在日常生活领域通晓俄语的水平上与俄国人长久实践。中东铁路专属自用地带俄侨区发达基础设施的存在加速了侨民公会机构的组建进程。数千人众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紧凑散居乃是难民流亡者们团结起来的又一强大因素。满洲俄侨群体在远东最有人气,30年代初就多达6万人。然而向完整社会实体的整合却被驳杂偏多的政治组织之间的不断争斗所妨碍,它们个个都乞求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领导地位强加于社会。接近苏联边界这一点则促发为数不少的反苏小集团增多,其中的几个积极地进行过针对苏联的破坏活动。

日本占领以前,哈尔滨和其他几个中东铁路专属自用地带内区域养成了革命前俄国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而且侨民仍然是一盘散沙,没有能够在当局面前代表其法律、经济和文化利益的统一领导中心。所以侨民群体中还存在诸多有待于尽快解决的问题,例如:明确的法律地位、失业、低下的生活水平。即使是情况境遇良好顺遂的“霍尔瓦提亚”(意为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中将管辖地带)也不能保障其中大多数一贫如洗来到满洲的成千上万人起码条件。满洲劳务市场无力满足急剧增长的上岗就业需求。数量庞大的侨民只能指望非体力劳动,即便如此他们也竞争不过愿意干低工资粗重活的华人。

尽管流亡难民生活艰辛困苦,侨民们在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不仅保住了华人的吃苦耐劳不挑剔,而且增进了满洲俄罗斯前辈先驱开拓者们完成造就的一切。当时哈尔滨出现了俄式高等院校网,普及教育和托幼保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戏剧和音乐艺术繁荣起来,簇新的寺庙殿堂拔地而起,俄文印刷品出版物顺利发展。出生在满洲|东北|的第二代侨民进入父辈双手创造的革命前俄国的境界。

满洲的被日本占领状态对俄侨群体的命运具有双重影响。在占领之前日本特工机关,就对分散在满洲境内的一些地方紧凑居住的“白俄分子”关注已久。为了实施对侨民群体的监控,占领当局在哈尔滨设立满洲帝国俄侨事务局,正式宣布它是满洲帝国政府的一个行政机关,占领当局一方面对侨民实施了严密监控,迫使他们迎合日本的大国计策谋划行动做事,另一方面,设立满洲帝国俄侨事务局,解决了侨民联合问题,使之尽力忙于迫切的侨民生计。由此可见,流亡难民群体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机体是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终结的。在日占年代,满洲帝国侨民事务局起着侨民政府的作用,其职权不超出傀儡帝国主子们划定的范围。这个机构调动着保障侨民公会生活活动和民族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在华北,侨民群体

进化成为民族公会的过程被几个因素复杂化了：一是在这里定居的人数较少；北京1927年才约有200人，即便是在“白俄”人口最集中的天津，其总量在30年代中期仅达6000人，而且包括日占之后来自满洲的。另一个因素是削弱与侨民公会联系的是相当大一部分侨民散居于外国租界区域内。1926年至1930年只有英租界住了俄侨群体1/3多的人¹¹。整体融入西式实业与文化生活，让子女在外国学校受教育，此种风尚加重了年轻一代侨民民族文化意识的淡薄化，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同自己的俄国人身份。天津侨民公会没能提供比在欧洲人租界更好的生存条件，所以相应地也就失去对很大一部分侨民的影响。

如果说在欧洲侨民群体进化为稳定的民族公会的过程终结是与满洲国侨局的设立相联系的话，那么日本人在满洲对侨民采取的策略却不允许他们解决自己的联合统一问题。

远东第二大俄侨群体出现在上海。到30年代中期，他们在这里约有两万人，到40年代初，约有四万¹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区域大多数侨民的紧凑散居状态对俄侨群体的发展特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法租界市政当局十分同情白俄的命运，在其苦难流亡生涯岁月中最艰辛困苦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扶助。公共租界当局对侨民们也是和善礼貌相待。

也如同在其他侨民中心城市一样，在上海居留初期失业成了难民流亡者遭遇的最尖锐问题。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高潮年代侨民以一部分人当工贼为代价致使失业减少，这不能不引，起华人的愤慨，但是与此同时，俄国人取代华人的外国企业老板们这才相信侨民们的可靠和职业能力。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宽松状态及其市政当局对“白俄”的和善态度，促进了他们较快地整体融入接收方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哥萨克协会会长И·H·申德里科夫证实，早在1928年达到1万人的俄侨群体中只有不多几个失业人员，哥萨克中一个也没有。这时俄侨成了上海文化和工商生活的非常明显的积极分子……”¹³

侨民公会的机构化大体结束于30年代中期。此时俄侨总数增至2万人，主要是依靠来自满洲的移民。上海的俄国居民整合成为民族公会的过程完结之前，缺少那种能把侨民们团结成为统一整体的侨民核心。由于各种不同侨民组织和派别之间的对立，所以20年代俄侨群体中形成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特殊局面；代议机关的职能同时由两个组织——俄侨权益保卫委员会和侨民委员会一行使。后来全体侨民中央的角色则由俄罗斯民族公会、俄国人联合组织理事会、俄罗斯民族委员会承担。40年代初，在日本占领当局方面享有礼貌名声的俄侨委员会确定了自己的俄侨群体领导核心地位。在上海俄侨历史的最后时期，代表他们在国民党中国和菲律宾利益的是俄侨协会。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远离苏联疆域，自由民主的氛围一没有为反苏派别和过激分子的积极活动提供土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形成了有利于民主派“白俄”生存的环境。大体上看，俄侨群体政治生活并不特别紧张。

整体融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成了惯常现象的国际婚姻等等，都促进了西方文明准则和观念在众多侨民的精神世界中积淀下来。这尤其关系到在外国学校受了教育的第二代在上海，也如同在天津一样，有不少不会说俄语的俄国儿童。然而在这座世界主义城市的国际化环境中，俄侨群体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一方面表现出顽强坚毅的气概，另一方面则是在变化多端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适应力可塑性。

陷入政治冲突的震中之后，在华俄侨没有得到经历宿命的进化道路的机遇。笔者所做研究表明，侨民流散族群三大家园——满洲、华北和上海的发展各有其特点。关于外部因素干涉的保留意见，可以说30年代下半期满洲组建了稳定的民族公会。上海的侨民群体则接近成熟公会时期，而华北尚未形成作为俄侨组织核心的公会成立的土壤。

在华俄侨下一步命运将会如何，政治因素不要干预其发展进程么？正如民族学者们所论断的那样，从前景观成熟的流散族群有两种进化方案：(1)同化，即溶化在接受方社会之中；(2)变成是居留国有机一部分的民族群体¹⁴。考虑到俄中两国间长远的文化距离，可以推测，在华俄侨的未来应该走第二条道路。即便如此也要注意第二代侨民某些个体被同化的概率。这首先关系到混杂婚生的子女，受过西方教育并且深度融入西方社会文化的以及外国租界的居民。

参考文献

- [1] Г. Я. 塔列列.《俄侨环境适应历史问题学术研讨会》，《国史》俄文版1995. (05): 198-200.
- [2] 列文.《流散族群的精神世界（系统与社会文化分析）》，2001.9-44.
- [3] 佳特洛夫.《流散族群：概念界定尝试》，载于《流散族群》，1999. (01): 8-23.
- [4] А. 米利塔列夫.论“流散族群”这个术语的内涵（定义探讨），同上，1999. (01): 24-33.
- [5] И. В. 萨边尼科娃.《俄侨（1917-1939）：比较类型学研究》，特维尔金字母出版社，俄文版2002.
- [6] Н. Е. 阿布拉娃.《中东铁路与中国俄侨史（20世纪上半叶）》，明斯克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俄文版1999.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发展初探

李福平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山学校 广东 深圳 518118）

【摘要】《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指出：“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朋友和领导者^[1]。”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决定着少先队员未来的发展，因此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十分重要。当前因辅导员队伍流动性大和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队伍出现人才稀缺匮乏的问题，提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能力和素养，构建一条行之有效的辅导员专业化发展路径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本文对此展开论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能力发展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0.09.645

引言

目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队伍呈现专业化发展道路迷茫、人员流动大、辅导员制度不完善、人才稀缺等问题，影响了少先队儿童的发展与成长^[2]。加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建设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打造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发展平台、提升少先队辅导员的职业地位，才能有效提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落实少年儿童的工作。

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问题

目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问题主要呈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辅导员自身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主要与辅导员的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有关；二是辅导员工作得不到认可，学校对于少先队的支持停留在表面，并未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与配合；三是少先队辅导员的学习时间较少，培训活动较少，专业化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四是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人员流动较大，致使辅导员工作队伍青黄不接，极大影响了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五是部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对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没有规划或规划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致使工作缺乏热情和动力。

总的来说，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与辅导员自身的个人态度、价值取向和学校因素等相关^[3]。为了提高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专业化能力素养，就需组织给予他们发展的平台，重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助力他们的专业化发展。

二、提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能力的对策

（一）打造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专业化发展平台

部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个人工作积极性不足，缺乏自我提升动力和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这就需要学校从辅导员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来为他们打造专业发展平台。

1. 加大培训力度，提升辅导员专业知识技能。

因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人员流动较大，部分辅导员的学科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还有待提高。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建设完善的培训体系，有助于少先队辅导员掌握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助力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

理论知识需要辅导员花费时间精力自学，比如搜集前人的优秀经验和技巧，阅读《少先队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基本理论》等等，及时上网了解与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领域相关的文件、政策等，进而有助于辅导员把握专业方向，提升自身能力。而专业技能的学习就需要学校、社会的培训。比如可以成立省、市、县、镇等为一体的少先队讲师团，他们负责编写教材，组织少先队辅导员展开交流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少先队辅导员可以借鉴优秀的经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学习先进的信息技术，掌握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少先队活动课的相关知识技能。在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双重学习、培训中，助力少先队辅导员的专业化发展。

2. 举办能力竞赛，提供辅导员专业发展平台。

部分少先队辅导员自我提升动力不足，缺少专业化发展的平台。这就需要组织能举办少先队辅导员的能力竞赛，利用竞赛去选拔人才，通过选拔优秀的人才来促进少年儿童的未来发展。而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即可为他们提供辅导员专业化能力的发展平台，比如辅导员的职称评审和部门推荐。

一是辅导员的职称评审是对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推动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途径，更是鼓励少先队辅导员学习、进修的重要方式。当确定少先队辅导员的职称评审后，辅导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个人提升欲望将得到激增。二是向有关部门推荐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能够丰富辅导员的知识体系，开阔他们的视野，在优秀的部门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政治素养。

（二）加强重视，提升辅导员职业地位